

引用本文:于毓蓝,陈小燕.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6):22-27.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4

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

于毓蓝¹,陈小燕²

(1.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江苏苏州 215000; 2.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09)

摘 要:在数字技术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建构具有时代紧迫性。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话语系统的影响,发现自然语言有代替人工语言之趋势,新媒介技术改变了传统话语传播模式,数字化知识体系重构了话语内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面临着虚拟交往带来的话语主体异化风险、信息过载带来的优质话语生产困难、互动性带来的主流媒体话语引导权消解等问题。因此,需要建构具备数字思维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体,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优质话语的数字化生产和传播,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中国特色”价值,从而契合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体系。

关键词:数字技术;数字思维;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1)06-0022-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的重大论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体系。其中,“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带,主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是对既有话语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建立符合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原则,能够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情况的话语体系。就时代性而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呈现出新的

重要特征,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领人类进入差异革命、智能革命、控制革命的“微粒社会”^[3]。数字技术带来对中国社会的解构和重新建构,也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卢恰诺·弗洛里迪将数字技术的变化总结为4个方面:一是实在与虚在的区分变得模糊;二是人类、机器和自然界的区分变得模糊;三是当它涉及信息时,从匮乏逆转为过剩;四是从以实体为主导转向以互动为主导^[4]。这意味着,信息传递和接受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虚拟社区的话语资源和话语交流较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

收稿日期:2021-08-10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9SJZDA088);2020年姑苏宣传文化人才项目(332112707)

作者简介:于毓蓝(1973—),女,江苏吴江人,副研究员,从事高校教育管理研究。

通信作者:陈小燕(1979—),女,湖北公安人,副教授,从事传媒专业教学研究。

丰富和更频繁,话语表征也面临更多歧义的风险。我们活在一个超记忆的世界,任何图像和声音都能被手机之类的设备捕捉到并快速地存储下来,但我们却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即便是借助智能机器,我们的心智亦难以消化全部的信息内容。因此,传统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在当下数字技术背景下已不能产生有效的实践逻辑,新的话语建构尤为重要,尤其是如何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且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则更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因此,我们需要深度分析数字技术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革命性影响,思考当前面临的挑战,并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价值等方面,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

一、数字技术创新带来的话语系统革命

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改变了话语生产和接受的传播模式,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关键技术变量。现代社会,以数字媒介为表征的社会交往与工业社会大相迥异:信息互动的主体由实体化转向虚拟化;信息存储、传播以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方式实现了智能化;相较于飞机、高铁等推动组织和个体突破地理限制的跨区域交往,数字技术则在身体交互之外开创了新的信息交流方式。数字技术的变革,实现了社会群体中处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化的人连接在一起的共时性互动。社会互动方式的变化、媒介技术的革新,为话语模式的变动带来了新气象,对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土话语提出了新要求。

1. 自然语言有代替人工语言的趋势

语言是话语的基础,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工具,同时在数字语境下也是机器指令的集合。这实际上指向了语言的两种面向: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使用的、具有情感表达或者是有意义的表述;计算机的语言则是没有情感的,计算机鼓励人们用简洁的象征符号比如说表情符号来交流沟通。在计算机技术发明之后,作为机器指令集合的自然语言主要是在物与物、人与物的交互中运用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语言在人与人的社会交互中被广泛运用,也与人工语言产生交互。“在数字化人类表达时,社交网络协议开始改变语言,让其更加适用于机器传输和解读,比如‘点赞’按钮和其他形式的在线沟通方式,消除其模糊性以及不坦率性,他们将语言塑

造得可以更好地满足计算机网络机器拥有者的需求。”^[5]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后的资本推动下,自然语言相对于人工语言,其替代性特征越来越强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及的异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人的思想、精神、语言等几乎所有与人相关的事物和事务,都逐渐能够被数据表达,“微粒社会”、数字技术使每个人都像显微镜下的微粒一样,可以被清晰地看到、察觉;而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又反向重构人的劳动和交往方式。工具与使用工具的主体在相互作用中呈现出新的主体形态,这成为数字技术背景下话语建构的首要挑战。

2. 新媒介技术改变了传统话语传播模式

纵观媒介技术演变历史,每一次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改变了人类交往的时空,也推进了话语传播模式的变迁。人类经历了从固定时空的传播到跨越时空的传播,前者如狼烟和火把等信号可以把遥远距离的信息相连接,后者如碑刻或者陶器上的图纹可以跨越时间把信息传递给后人。及至文字的出现,到书本、报纸、留声机、广播、电话、电视再到互联网,对媒介的界定始终是“连接时空的媒介”。但是,互联网新媒介的出现、数字技术的出现,使这种“连接时空”特性有了新的内涵,它不仅是指跨越时空的静态连接,更是一种动态的连接、共时性的连接以及多维度的连接。互联网技术媒介从互动性上超越了以往任何传统的媒介,对话语生产与话语阐释的冲击前所未有的。以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打破了过去只能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内进行信息接受或者信息言说的传统模式,话语信息的传递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呈现出“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特征。“这不是传统意义上以内容为中心、具有清晰起点与终点的‘媒介使用’概念的延伸,而是一种代表随时随地、持续不断在线与连接的新生活方式与存在方式。”^[6]在传统媒介时代,社会生活的主体大部分都在线下展开,对媒介依赖的程度不高。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算法技术的发展,线上内容与线上社区急剧增多,个体一旦失去网络,则有“错失恐惧”之感,基于用户使用习惯的智能推送,使得个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越来越被技术所影响和左右。这意味着,数字技术背景下媒介情境的变化,给人们的话语信息理解、获得与表达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3. 数字化知识体系重构了话语内容

数字技术创建了全新的新媒介语境,人工智能、5G、平台经济等构成的 IPV6 时代的传播场景出现,新的传播格局和新的工商业业态已然形成,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往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知识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技术与制度、技术与思想、技术与人的交互作用必然推动相关交叉学科的发展。由此,“新文科”的知识融合成为趋势,学科间的联动助推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需要一套知识系统支撑,特别是融合数字技术的新知识的支撑。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理解和分析事物,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的逻辑。大数据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模式和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我们则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数据话语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数据除了具有客观、科学的特点,还具有话语特征,用数据说话产生了一种新的话语权。”^[7]比如,当我们描述中国的防疫抗疫工作成就时,数据话语尤其是大数据具有相当的优势,它们相对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历史话语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传播性,也更具有生产性和应用性的功能。

二、数字技术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面临的挑战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不是对既有话语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原有基础上,与时代需求相适应,与技术发展相匹配,融合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优质资源的融合性建构。数字技术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在空间、载体、思维方式以及交往方式上的新变化,必然表现出话语的内涵与外延的新拓展,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新时代的烙印,呈现出差异性的话语表现全新样态。在数字技术根本改变话语媒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是回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之举,但也面临着相应的挑战和问题。

1. 虚拟交往带来的话语主体异化风险

在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媒体等数字媒介技术的影响下,信息的生产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构建出多重的、不稳定和分散的主体^[8],此种主体分

散的现象对现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新媒介虚拟社区的话语实践代替了传统现实的文化实践,造成了话语接受主体的异化问题。数字技术背景下的话语表达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网络社区的话语陈述表现为一种群体意识淡化的倾向。以“个体”为中心的信息传播系统创造了自由言说的空间,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问题,比如青年亚文化的表达问题、社交网站的虚拟交往与情感表达等问题。“新媒体远非漂浮的,它是‘融合复杂的社会意识体系’的一部分。”^[9]因此,在全面数字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更要紧扣时代的独特风格,把握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诸种现代性后果。“如何在古今、中西两个维度分清时段、区隔层次,对理论的传统属性与现代属性、日常语言与学术语言、西方特质与中西共同特性,以及中国尝试作出的独特探索进行知识上的描述与分析”^[10],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谈论独特话语建构时需要重视的方法意识。

2. 信息过载带来的优质话语生产困难

“信息过载”是指社会信息超过了个人所能承载和处理的范围,从而引起知识焦虑。“这种情形在数字媒体时代尤为突出,以用户生成内容(UGC)为特征的自媒体所产生的大量信息由于缺乏专业制作和内容审核,导致人们在需要信息帮助时,找不到可靠信息的指引,进一步加深了知识焦虑。”^[11]面对价值取向多元、非主流信息增多、社会思潮激荡的局面,如何生产更多优质的话语内容,减轻公众的信息焦虑,则是话语内容建构的当务之急。优质话语内容的生产离不开对话语本体论的认知。在过去经典的话语研究中,话语是指人类交往活动中以特定符号和言语表达而建立起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它包括了术语、范畴、思想和判断等要素。福柯主张“话语就是看待世界的方式”^[12]。从实践来看,话语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精神、理论创造的外在反映。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达。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数字技术背景下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就越来越迫切。当前的难题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和对外传播,远远滞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以,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之时,在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探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话语建构问题,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优质故事、经典故事,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3. 互动性带来的主流媒体话语引导权的消解

与过去传统媒体时代以实体为主导相比较,当下数字技术背景下人们以互动为主导,这种互动表现为人与人的互动、人与机器的互动、机器与机器的互动,甚至还包括了人与智能机器人的互动。这意味着主流媒体在话语传播模式上出现了多个维度的传播对象,而如何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日常话语并凸显主流媒体的权威地位,则是数字技术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互联网中的话语强占现象不容小觑,新闻者的角色在新媒介时代也要相应调整,不能仅仅满足于‘瞭望者’,更要发挥‘引导者’的主动权。”^[13]现有话语总体表现出一种众声喧哗的特征,这对于建设一种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极为不利,甚至有阻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这说明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对外话语传播方面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尽快作出改变。中国的主流媒体机构亟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其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

三、面向数字技术发展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之路

在万物皆媒、一切皆可数字化的时代,数字技术日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交往的主宰力量,数字化改变了我们的沟通交往和社交习惯,人类已从尼葛洛庞蒂所预言的“数字化生存”进入到“数字化生活”。人们如何在线上线下更好地交往与沟通,是当下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无论是传统媒介时代,还是数字媒体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载体都是语言,核心是表达主体、表达内容和传播旨向。因此,建构与数字技术发展同频率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需要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价值等方面探索可行之路。

1. 建构具备数字思维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体

第一,充分认识数字技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秩序的革命性影响。数字技术背景下,人们的信息传播秩序发生着重大变化,用户从过去接受已生成的内容变成现在自主贡献内容。“一方面,自

媒体信息量的激增使信息飞沫形成;另一方面,精英和权威的传统表达优势被削弱,形成‘去中心化’的舆论场域。这种权威性的弱化使多元的话语和意见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公共话语进入了多元话语共存下的对话与对抗。”^[14]因此,在多元、互动、交叉的信息场域中,每个人都成为了主体,但很多人没有做好这种准备,没有意识到话语秩序的改变。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应正视话语权力秩序带来的风险,谨防话语主体个体化带来的群体意识虚无和外部势力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话语渗透的风险。同时,也应充分肯定数字技术给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带来的新机遇、新便利、新成效,以辩证思维去理解和应用数字技术。

第二,充分认识数字思维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体的重塑性作用。思维决定行为,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则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数字技术背景下,借助计算机精确的大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表达更加丰富精准;数字信息和媒介技术的介入,改变甚至可以说重塑了作为人的话语主体的思维过程,创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在这种影响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意无意地采用了更加数字化的视角,在话语设计上,不是天马行空地随意铺陈话语,而是话语目标更加清晰,解决问题更加务实,话语表述更有针对性,话语逻辑更加严谨;在话语内容上,不是空洞无物、泛化虚化的表述,而是更加注重量化精准的数字表达,讲求海量数据的归纳论证,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重视信息来源的多角度;在形式上,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字堆砌,而是变得更加可视化、图像化、多维化、动态化,更加讲求主体间的交互和反馈,更加注重信息管理的协同和创新。作为人的话语主体,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思维方式变得更有逻辑、话语表达更加精准、解决问题更加高效。而这种数字思维,基于人的主动性作用,也在各种媒体平台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体上放大展现出来,同时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第三,充分认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体在数字技术背景下的多元性特征。数字技术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体包括主流媒体、自媒体以及个人用户等有生命的人,也包括自动化算法机器等无生命的内容生产者。传统主流话语主体,应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新发展,利用微博、

微信、短视频等移动数字化平台强化自身的传播能力,对自身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等进行系统性的改造,使得自身在数字化场域中的反应能力更快、表达能力更强、传播效果更好。例如,一些年轻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利用微信公众号、移动短视频等平台来传播自身所在学科领域的前沿知识,改变了传统以学术期刊、专著为主要载体的话语传播格局;一些知名学者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中国治理经验的重要话语生产者和传播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体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自主学习等数字技术,建构数字化的虚拟话语内容生产者。另外,知名互联网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已成功自主创作论文、诗歌。自动回应、智能化的内容生产,也将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生产的方式之一。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体,要自觉运用模型思维与算法批评,避免各种认知偏差,利用大数据来拟合、校准、检验因果关系与相关性,利用模式识别、算法模型等辅助手段处理海量和随机数据,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动态地认识和改变世界。

2. 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优质话语的数字化生产和传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生产的根本指针。话语主体的多元化、话语传播的互动性,容易造成话语内容生产的失序。一些资本、政治势力等主体利用数字技术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生产中进行渗透,动摇话语接受主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部分平台上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频现。在此情形下,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指导思想,全面加强党对数字技术企业、数字媒体平台、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内容生产组织和传播组织的领导,利用数字技术对中国发展和治理的重要举措、经验及时加以捕捉、搜集、总结、传播、共享。

第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优质话语建构应聚焦于人与自然、人与技术、历史与未来、国内与国外等多重维度。优质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指能够妥善解决人群和个体发展焦虑的答案。人的发展焦虑无非来自这些方面:认识和利用自然过程中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冲突,如污染问题;发展技术、提升生产力带来的所谓技术决定论的危机,如数字鸿

沟、信息安全;对过去历史的忘却,对当下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的无望;国内发展的秩序化与国外环境的竞争性;等等。因此,优质话语建构应围绕这些维度展开。如,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发展内容之中;对于人与技术的关系,数字技术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只是参考答案,人类的作用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15]。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应更关注人的主体性,关注人在技术主宰的社会中所发挥的独特价值,运用人文关怀的理念进行话语阐释。“话语如果脱离现实,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16]对于时间维度的话语内容生产,要充分把握时代的脉搏,调整话语的语汇形式和表达方式,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提炼、弘扬和发展,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讨论和解答,并对国家和全人类的未来作出探索、预判和规划。对于空间维度的话语内容生产,则要准确把握世界变局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交汇,凝练出有时代感召力的中国话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而贡献力量。

第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数字化生产与传播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新的科技成果不断产生并融入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想和思维方式、行为和交往方式,也不断影响着社会发展形态,展现出数字化生活的美好场景和广阔前景。线上线下的沟通可以快速转换,空间地域的限制已经不复存在,数字话语的生产传播更加迅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必然要指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握时代性特征,用好大数据思维,面向高质量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生产和传播的需要,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3. 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中国特色”价值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突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就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历史实践、发展趋势进行内容生产,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以回答好时代命题。在话语表达上,要有国际化的视角,采用科学化、民族化、现代化的话语表达方式,形成一个完整的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

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而有关“中国特色”,重点是要吸收和借鉴符合中华文化传统、民族思维、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阐释中国观点、表达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第二,坚持人民主体性的立场,提升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互动性。数字技术背景下话语主体的互动性,在本质上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生产和传播的人民主体性并不冲突。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应坚持人民主体性、价值性的原则,即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话语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是为了人民、服务于人民的,这与某些国家政治体制下话语建构由经济寡头、政治精英把控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在实践机制上,就是要利用移动数字平台,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生产和传播中来,使人民群众既作为话语的生产者,也作为话语的接受者,以全过程的人民民主而非西方仅限于选举阶段的虚假参与来保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

第三,坚持严格有效的制度性监管,维护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秩序性。强调人民群众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并非是为了实现话语建构的互动性而放任多元主体的无序行为。话语主体变化的背后是权力秩序的变化和移动互联技术带来的技术普惠,每个主体都可以进行自我表达,“社交媒体产生了一个新的亲社会维度,这超越了传统媒体的局限。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讲述形式,其奇特之处在于:一是凡是能上网的用户都能参与讲述,二是讲述某件事情的氛围能刺激主流媒体作出回应”^[17]。但话语主体的多元化会消解群体意识、主流意识,特别容易受到不良资本、政治势力的左右。因此,以制度性的管约束话语主体的行为是必要之举。具体而言,国家应加强对技术公司、网络媒体、组织化和个体化话语主体的监管,严控资本和政治势力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生产、话语传播中的渗透,通过立法和行政监管的方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大数据的国有化,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数字空间的国家主权。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18]。那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必然将不断契合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的内容体系,在建设数字中国、推动现代化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02).
- [2]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2019(5):4-22.
- [3] 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M].黄昆,夏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3.
- [4] 卢恰诺·弗洛里迪.在线生活宣言:超连接时代的人类[M].成素梅,孙越,蒋益,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54.
- [5] 尼古拉斯·卡尔.数字乌托邦[M].姜忠伟,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248.
- [6] 周葆华.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新闻大学,2020(3):84-106.
- [7] 王增智.运用数据话语推动话语体系建设[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24(001).
- [8] 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于社会语境[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27.
- [9] 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M].董晨宇,唐悦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09.
- [10] 任剑涛.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J].行政论坛,2021,28(2):5-18.
- [11] 陈小燕,周洁.信息过载背景下的主流媒体短视频新闻功能探析[J].视听,2020(11):151-152.
- [12]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226.
- [13] 陈小燕.信息焦虑与建设性新闻功能设置的三重思维[J].当代传播,2020(6):49-52.
- [14] 宋琳琳.社会学意涵下公共舆论的多元话语[J].青年记者,2020(6):24-25.
- [15]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33.
- [16] 张卫良,薛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逻辑理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3):1-8.
- [17] 詹姆斯·柯兰,娜塔莉·芬顿,德斯·弗里德曼.互联网的误读[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54-155.
- [18]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求是,2020(21):4-10.

(责任编辑:许宇鹏)